

反腐败呼唤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Anti-corruption call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

于喜繁 于海明 丛娟◎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韩山师范学院学术文库丛书
韩山师范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反腐败呼唤 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Anti-corruption call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于喜繁 于海明 丛娟◎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腐败呼唤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 于喜繁, 于海明,
丛娟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206-13594-1

I. ①反… II. ①于… ②于… ③丛… III. ①反
腐倡廉—研究—中国②民营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 IV. ①D630.9②F12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5672号

反腐败呼唤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著 者: 于喜繁 于海明 丛娟

封面设计: 蜀铭文化

责任编辑: 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9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3594-1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序言：计划经济的制度难题催生出改革的必然性·····	001
第一章 利益驱动与观念嬗变的两重性	
一、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与金钱目标的关联性·····	003
二、市场经济无法祛除享乐主义的价值准则·····	005
第二章 商人暴富对腐败的诱致效应	
一、收入分配多极化是改革认知分歧的根本动因·····	018
二、效率是手段，不是终极目的·····	021
三、少数富人的非法收入与腐败现象融合共生·····	027
第三章 反腐败与发展民营经济和谐共进	
一、反腐败能够净化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公平竞争···	041
二、反腐败能节省政府成本，为民营经济提供优质服务···	045
三、有“清商”才会有“清官”和廉洁自律的公务员·····	055
第四章 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监督难题	
一、集权体制的利弊得失·····	059
二、“自上而下”的监督亟需构建有效的奖惩机制·····	069
第五章 间接民主政体强化“自下而上”监督的迫切性	
一、直接民主的制度难题与民主手段的非至上性·····	078
二、间接民主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087
三、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	098
第六章 政府职能的双重效应	
一、节约协调成本维护社会秩序：政府设置的必要性·····	107

二、政府的经济人属性：权力违规运行的内在冲动·····	112
第七章 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结构性张力	
一、正外部性不能全部内在化弱化了参与意识·····	120
二、市场逻辑的扩张与意识形态约束力下降·····	121
三、特殊国情增加了贪腐案件的查处难度·····	131
第八章 职位竞争与身份神圣化压力寻求补偿	
一、职位竞争与攀比意识使官员背负巨大压力·····	138
二、身份“拟圣化”使官员承载着沉重的“包装”负担·····	146
三、“补偿”与“释放”意识使少数干部沉迷酒色逸乐·····	154
第九章 亲人·商人·友人·部下：考验官员的关系网络	
一、亲人、友人、部下是官员必需的关系网络·····	160
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艰巨性·····	166
三、“沾光”与攀比意识使官员难以拒却非分要求·····	171
第十章 未受重用的不满心理与他人贪腐的诱致效应	
一、干部选拔制度的技术难题妨碍着选拔结果的公平性·····	177
二、高昂的查处成本制约腐败案件的查处概率·····	181
三、未受重用的不满心理和他人贪腐未被查处诱致腐败·····	185
第十一章 反腐倡廉对策建议思考	
一、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努力缩小收入差别·····	193
二、严惩行贿犯罪，加强对民营经济的引导监管·····	198
三、强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体系·····	201
后 记·····	214
参考文献·····	215

序言：计划经济的制度难题催生出改革的必然性

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都可以佐证，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没有腐败现象。这一历史事实至少足以引发我们如下的思考：既然改革会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权力腐败这个“魔鬼”，那么，我们当初又为什么非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可呢？

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而且也没有兑现它所高调做出的公平承诺。

一、公有制的制度难题与非公有制的动力优势

公有制经济缺乏动力，既有人性层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从人性方面来看，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中的人性也不完美，也没有“神人”和“天使长”。“天使长象征一个著名的主张，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存在，必须有道德水平为先决条件，像现在这样的人，不能期望他们达到这个水平。”^①因为，如果有了神人和天使长，有了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无私奉献”精神这一前提，即使收入分配不公也不会挫伤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也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计划经济时代超强的意识形态约束力虽然能够有条件地做到这一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际效用

^①（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5页。

呈逐步递减趋势。这一点，马克思当年在构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制度蓝图时，就已经前瞻性地预估到了。为了防范公有制经济因为动力缺失导致效率低下，马克思设计了按劳分配制度来激励和制约劳动者，以保证公有制经济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之后，同时具有比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更高的经济效率。

但是，马克思当年所依据的主要是纺织业、食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者所从事的主要是在技术上可以精确衡量的同质性劳动。因而，仅仅通过计件工资的形式，就可以十分准确地计量出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少，这就为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扫清了技术障碍。实行了按劳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就可以有效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

然而，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这种在技术上能够精确量化的同质性劳动在人类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愈益减少，不可精确量化的异质性劳动在总劳动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例如，到了2015年，第三产业占我国GDP的比重就达到了51.7%，2016年上半年，更是占到了54.1%。第三产业的许多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诸如领导干部的管理性劳动，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劳动等异质性劳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在质的维度上无法精确地分清优劣，在量的维度上无法准确地衡量劳动量的多少。这样一来，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社会主义既然也与资本主义一样没有“神人”和“天使长”，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性也同样不完美，因而也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来对人的劳动进行激励和制约，即存在着对完美制度的高度依赖性，以实现人性的缺陷由制度来弥补。但是，由于按劳分配制度在异质性劳动中“失灵”，它就无法实现激励劳动积极性的预期目标了。

公有制经济的动力缺失催生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生存。众所周知，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这两种主要形式，当然还包含着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成分。

个体经济属于小私有制的范畴，而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前者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偶有合法生存的权利，但多数时期还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后者作为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当时自然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命运和待遇，即使连“洪水猛兽”这样的称谓也难以喻其万一，这一点，从我们今天仍然拒不承认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中，就可以完全折射出来。

私营经济就其性质而言，毫无疑问就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它的内涵即本质规定性是，财产归老板私人所有，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不管是自诩为超越姓“资”姓“社”争论的所谓思想解放的宏论，还是“民营经济”这种模糊化的称谓，都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我国现行最权威的教科书，都不否认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

我们重新接纳私营经济这种明显包含有剥削的经济形式，实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有制经济的效率究竟如何？冷冰冰的经济数据最有说服力。例如，在改革开放前夕的1976年，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一千三百三十九亿元”，“进出口贸易完成二百六十四亿一千万元（折合一百三十四亿四千万美元）”，“国家财政收入完成七百七十六亿六千万元”。^①我国大陆当时的总人口数为9.3亿，上述各项数据的人均占有数量自然就不难计算出来了。

其实，人们对公有制经济的效率的质疑，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止息。现在，不少论者仍然因为国企部分垄断利润转化为其职工高福利的事实，而力主“去国有化”，也有人建议划出部分国有资产来弥补养老金缺口。我们当然不会完全无条件地赞同上述这些错误的观点和主张，但这至少足以说明：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合法生存权利，已经是坚如磐石、不可动

^①倪忠文，谭慕雪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

摇的了。当年的中国改革对于公有制经济来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改革，而在于到底应该怎样改；不在于公有制本身有无缺陷，而在于改革之后诞生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何弊端。因为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当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二、计划经济的效率难题与市场经济的强势超越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当年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时曾经指出，这一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内涵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平等地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正是这一人人平等、共同参与管理的崇高目标，成了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精神动力。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预想的这种全体自由人共同管理的政治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有两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一是全体人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由于时间的稀缺性，因而这在技术上绝对不可能。对此，马恩自己也并不否认，这有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仍然要有“命令”和“服从”，即仍然要有“权威”的论述为证。但是，这样一来，所谓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管理”的理想性承诺，就只能退居为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管理者这一现实结果了。但机会平等却并不为社会主义所独有，资本主义也同样自诩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二是既然要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分，要“设官而治”，那么，社会能否确保有一个完善的管理者选拔方式，以保证当选者德才兼备呢？答案仍然是高度的不确定。主要原因既是由于管理者的德才标准面临着无法精确衡量的技术难题，也由于选拔这些管理者的群众（选民）自身的道德和才能约束。

既然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直接管理公共事务在技术上不可能，因此必须“设官而治”。而我们选拔官员的具体制度又肯定不完

善，而且作为“裁判”的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和认识水平也同样不完美，因此，由这种官员遴选机制选拔出来的管理者，在道德与能力方面就肯定存在着某些缺陷。在对他们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决策脱离实际，从而引发稀缺资源的低效率配置。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以人治代替法治，严重窒息人们的创造性活力，经由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最终导致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

诚然，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经济确实在寻求消灭剥削、实现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而公平正义本身也确实是人类社会贯彻始终、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在其旷世名著《理想国》里就曾指出：“现在我们要寻找的正义，比金子的价值更高。”^①柏拉图的这一至理名言可谓一语双关，既表明了社会正义在人类所追求的理念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又蕴涵着它比经济效率（“金子”）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循此逻辑，似乎只要有了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前提，包括物质财富在内的所有其他东西都可以弃置不顾。

但是，不要说人类在追求公平正义时无法将经济效率目标完全抛却，即使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作为唯一选择，柏拉图最杰出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告诉我们：“平等有两种：数目上的平等与以价值或才德而定的平等。”^②显然，前者就是人们在针砭计划经济体制时所指责的平均主义，亦即结果平等，而后者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机会公平，亦即包含着合理差别的平等。亚里士多德高于其老师之处就在于，他不再是抽象地议论“正义”是如何的宝贵和如何的重要，而是给人类提供了平均主义与合理差别基础上的平等这两种选项，供人们进行挑选。此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选择与

①（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争论，就一直围绕着上述这两大目标动态地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化取向的拥趸正是抓住了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平等”的这两种含义，把前者即平均主义的弊端分派给了计划经济，而把后者即合理差别基础上的平等的“香粉”搽在自己脸上。本书下文的分析将会表明，它们这种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行为当然是十分拙劣和徒劳的，但是，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法则的拥趸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批判，却是一击而制敌死穴，抓住了对方效率低下和公平缺失的双重缺陷。“全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也有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民不约而同地选择市场经济而排斥计划经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缺乏生机活力的最好证明。否则，就只能得出地球上几十亿人都集体失去理智的结论。”^①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末期寿终正寝，市场经济体制在一统江湖之时，其制度弊端和缺陷也就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当然，不管市场经济本身存有何种功能缺陷，计划经济体制都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关于制度悖论，我们虽然已经在以前的论著中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但是，一则有的读者对此产生了某些误解。例如，有人就曾经单纯根据我们的著作名称，望文生义地把所有制悖论与经济体制悖论，误读为所有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悖论。二则主要是因为，在现代这个信息海量涌现、因而时间高度稀缺的互联网时代，多数人没有时间静下心来仔细地阅读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因此，这里举一个人尽皆知的例子，来通俗地阐释制度悖论的基本原理。——这就是汽车的发明、使用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双重影响。

显然，汽车的正效应是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无比的便利，但其必然的负效应是交通事故无法完全避免。自从汽车被发明出来

^①于喜繁，丛娟：《所有制与经济体制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11页。

之后，全世界至少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车祸夺去了宝贵的生命。随着人类历史的无穷演进和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一不幸者组成的数字必然会不断增加，直至有一天可能会超过1千万、1亿乃至10亿等大关。我们可以、应该、而且能够尽量减少这一人数，但却不能杜绝这一不幸人数的增加。因为，要杜绝交通事故，前提就必须是要废除机动车辆，退回到步行或者以牛车、马车来代步的时代。人类不可能光要汽车的好处、完全杜绝其坏处，同样也不可能光接受它的坏处、完全享受不到其好处。

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如同汽车一样，也必然对人类生活产生双重效应。

腐败现象正是私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负效应！

第一章 利益驱动与观念嬗变的两重性

由上分析不难看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虽然主要源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生机活力这一倒逼机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改革对策及其成本代价完全是必需的，并不表明这些代价都在我们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

既得利益阶层在为现实进行辩护时，最容易采取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过分渲染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论证现实弊端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殊不知，从旧体制的僵化性中，只能引伸出改革“必须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怎样改”的问题。

二是打着积极拥护改革的旗号，通过偷换改革的概念来粉饰现实。例如，他们总是从改革的定义出发，强调改革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就不会产生诸如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制售假冒伪劣和滋生消极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都客观存在着，但却都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因此都不是改革本身造成的。这显然是把改革的定义与具体的改革措施混为一谈，企图以定义的完善为借口，来否定具体改革措施不完善的经验事实。这种鱼目混珠、偷梁换柱的手法，说明连他们自己在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进行辩护时，也理屈词穷、不得不求助于诡辩了。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虽然涉及许多方面和环节，但是，其核心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

下，过渡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主要是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新成员”；二是放弃或废除计划经济体制，采取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扔掉了计划经济体制，增加了市场经济这个“新成员”。

因此，要看我们的改革到底是否完善，关键是要看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新成员”是否完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分别加以论述。本章所要分析的主题是，改革在意识形态方面付出了什么样的成本代价。

改革的对象是经济制度（所有制关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但改革还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前提，这就是我们的人性也同制度一样并不完美。

这里所谓的人性不完美，主要是指人在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上不够完美。如果只是外在制度不完美，而内在的人性完美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对外在制度进行改革。例如，如果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够像我们的道德号召所要求的那样，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在意志品质上能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即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有再大的制度缺陷，那也没有必要进行改革。因为，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完善，就没有必要进行物质激励和制约，人们即使在分配上吃亏，也不会缺乏劳动积极性，何来制度改革之必要？

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现实的制度和人性都不完善，但又要不断地使之趋向完善，这就是人类社会始终必须面对的根本任务和永恒难题。从历史发展的总轨迹来看，外在制度呈现出不断完善趋势；与此同时，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和认识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人性正在经历着由“傻子人”向“精明人”过渡的历史性嬗变。但在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方面，这种“精明化”的趋势本身，也就意味着“无私”意识和刻苦耐劳意识有时可能会相对下降。这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其初创时期充满生机活力，

而在后来愈益凸显出惰性和僵化性，必须加以改革的原因之所在。而改革所付出的观念成本代价，就是这种趋利意识和幸福（享乐）意识开始突破社会可以承受的底线，一些人堕入了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窠臼。

本书的主旨是探讨腐败症久治不愈的原因，因而对“官德”——领导干部的道德操守状况必须做出清醒的估计，这就必须对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进行科学的整体评估。因为，领导干部作为现实的自然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一员，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道德水平必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客观认识领导干部的道德状况，离不开全社会道德发展水平这个大环境。

一、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与金钱目标的关联性

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机活力与其负效应是一体之两面，如同一张纸一样，有其正面就必有其反面。其生机活力即寓于其负效应之中，同理，其负效应也即寓于其生机活力之中。

这是因为，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之源就在于，它们用货币对成功者予以奖赏，以货币为尺度来衡量成败，这一金钱原则的固有弊端，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被柏拉图前瞻性地看到了。柏拉图指出：“在这原则统治下，我认为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如何更多地赚钱，激情也只被允许崇尚和赞美财富和富人，只以致富和致富之道为荣耀。”^①从以金钱刺激来作为激励和制约人的行为的手段，必然过渡到崇拜金钱、进而崇拜有钱者，至于金钱的来路是否正当、金钱本身是否“干净”，在有些人看来，则可以不管不问。

问题在于，这种金钱至上观念的危害虽然早在柏拉图那里就

^①（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6页。

已经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了，但是，至今却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完全有效的克制之道。今天的货币（金钱）拜物教和异化现象，远比古希腊时代要严重得多。“异化意味着没有整合与统一。在技术和商业的冲击下，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上，放在金钱、财富和权力上，而人的内心生活却被忽视了。‘经济人’是异化了的人的典型。他的行为限于意识的和明智的行为，所有自发的、情感的、非功利主义的行为都受到了压抑，这种人实际上已经被看成仅仅关心金钱的、被金钱主宰的奴隶。他的事实价值（金钱等）可能会很高，可是作为一个‘人’，他已失去了真正的自由。”^①

金钱作为抽象的财富，与物质财富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金钱不受任何边界和阈限的限制，具有多多益善的性质。诚如叔本华所言：“我们可将财富比作海水，喝得越多，越是口渴，声名也是如此。”^②

这种金钱万能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偏颇性与危害性，古往今来已被众多见识超卓的思想家所唾弃。法学大师孟德斯鸠在劝诫人们摒弃金钱时指出：“他们还应该摒弃金钱。因为金钱的效力使人的财富日益膨胀，甚至超越了自然所限定的界限；并且使人们学会毫无意义地保存那些毫无意义地积聚起来的東西；进而使人的欲望毫无节制地滋生。大自然原本给予我们非常有限的手段去刺激情欲，并促使人们相互腐化，然而金钱却弥补了其不足。”^③在孟德斯鸠看来，金钱财富的特点是，缺了不行，多了也无用。因此，超过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外的金钱积累是完全无意义的，这实质上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只需要拥有中等数量的财富思想的翻版。

①（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②（德）叔本华：《人性的得失与智慧》（文良文化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孙立坚，孙丕强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